

亿万农民工的青春之歌

新华社成都1月22日电(记者蒋作平、吴光宇) 2019年春运大幕已经拉开,千千万万农民工再次踏上回家的旅途...

闯广东“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

1988年初春,农历二月十九,川西平原上的油菜花开始绽放。16岁的青春少女王红琼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49名同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

1984年,我国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向流动人口逐渐敞开大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迅速增加,“农民工”称谓也随之而生。

1987年,时任金堂县竹篙区委书记的沈友春,与厚街镇劳动服务站签订劳务输出协议,为厚街皮具厂组织50名女工。这是金堂县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成建制”输出农民工。

沈友春回忆说,改革开放前,农村里最优秀的是会“使牛”的人,一手赶牛,一手掌犁,需要很高的技术,工分也最高。可是工分不值钱,分的粮食不够吃。因此,外出务工是农村生产力解放后的必然选择。

得知广东招工,尽管家人不舍,王红琼还是报了名。体检、选学历……接到录用通知时,王红琼和她的姐妹们感觉“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那一年,竹篙镇200多名女孩报名闯广东,最终只有50人被选中。妈妈以当地嫁女儿的方式,给她弹了一床新棉絮,爸爸把家里仅有的70元钱塞到她手里。

竹篙距厚街1600公里。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王红琼是“民工潮”中的一朵浪花。上火车时她就被挤丢了背包,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竹篙中心校长吴宛平一把攥住,才没与队伍失散。

车厢过道里水泄不通,连座位上都躺着人。她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亿万中国农民工将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崭新的历史。据广东省统计,1988年第一次“民工潮”时,进入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约有300万。

两天三夜后,姑娘们终于抵达广州。火车站人潮涌动,吴宛平拨通广方的电话,却听不懂对方的粤语。“过了好久我才知道,缸口说的就是街口。”她笑着回忆道。

辗转抵达厚街时已是离家后的第四天。

吴宛平至今保留着1988年金堂县劳动局局长高从永的一封信:“请你转告50名金堂姑娘,你们是金堂第一批到广东工作的,也是我县迄今为止第一批走得最远的,称得上是勇敢者。既然勇敢者的路迈出了第一步,就要坚持地走下去。”

从“盲流”到新市民 用奋斗书写青春

“春潮奔涌车声隆,百万民工闯广东。肩担手提行色急,城乡阻隔路始通。”走进金堂县农民工博物馆,这首小诗映入眼帘。磨出窟窿的编织袋、皱巴巴的火车票,还有那一封封被泪水浸湿过的泛黄家书,无声诉说着农民工们的奋斗史。

50名金堂姑娘第一次离家,兴奋之余带着一些悲壮。“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些姐妹刚到东莞就想回家了。”

车间从早上7点半到夜里11点都灯火通明,王红琼被分配到做包的车间,是姐妹中最拚命的一个。月底第一次领工资,最少的领到8元,而她领到了50元“巨款”。

在闯广东的潮流中,王红琼和她的姐妹们是幸运的。在很长时间里,农民工身份尴尬,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办不了暂住证,会被当成“盲流”收容,甚至罚款。来自金堂的孙志成1991年刚到东莞找工作时,为躲避查暂住证不得不住进“青山旅馆”——山为旅馆、天为被、地为床。同样来自金堂县的谷宇,在东莞经历了在烈日下晒太阳、做俯卧撑比赛等,因为上百人中坚持到最后的几个,才能被录用。

“既然出来了,不闯出个名堂绝不能回去!”这是亿万农民工的决心、雄心和信心。

即便在最闷热难熬的夏天,王红琼也没日没夜地加班。“天气热,屁股都坐烂了,麻木了都不知道疼。”厂里常播放《粉红色的回忆》,如今每每回忆过去,王红琼的耳畔响起它的旋律。在她展示的一张发黄的照片中,随着时间推移,姑娘们从羞怯变得自信。“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观念,让我们有了积极向上的努力方向。”

到1998年,竹篙镇外出务工人员数达到3.8万人,接近全镇总人口的八成,通过邮局汇回的资金总额高达1亿元。

1999年,金堂县劳务输出达到高峰,达到18万人。其中在厚街镇高达3万余人,厚街镇一度被外界称为“小金堂”。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是改革开放前沿建设的主力军。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亿多人。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自广东的外省籍务工人员保持1600万人左右,其中四川籍的常年保持在450万左右。千万农民工与勤劳务实的广东人一起创造了“广东奇迹”,共同建设大珠三角城市群。

石笋是至今仍留在厚街的金堂女工之一。这些年她所在的厂老板换了三任,但她作为骨干,一直备受赏识。这些年她赚钱买房、买车,供养孩子读书,还接来自己的双亲,从“外来妹”变成主人翁。

“金雁”归来 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化新阶段。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大批人群靠知识和技能,成为新兴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一批批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成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在“华蓥山游击队”闻名的四川广安华蓥市,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新兴产业新城,背后凝聚着返乡创业者的心血。1993年,高考落榜的李双林到东莞一家电子企业打工。16年后,他回到故乡广安华蓥市,创建了当地第一家电子企业。如今该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已有77家企业入驻,电子信息产业已由低端整机代工向高端消费电子、核心零部件生产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该市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

王红琼2006年回到金堂,开办了“锦洲成衣厂”,一年能接到上千万元的订单。除了竹篙镇“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的厂房,她还在4个乡镇开设了车间,解决了200多名姐妹的就业问题。

1998年,金堂县创建打工仔开发区——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区,2007年又实施“回引工程”,到2018年10月,已吸引2172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办各类实体2072家。

从“孔雀东南飞”到“金雁归巢”,王红琼走了18年。她说,漂泊在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照顾家庭。现在每天下班后,看到工厂姐妹们能和家中的孩子相拥相亲,只觉幸福满满。

现在,她收养了两个孤儿。“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让下一代成了留守儿童,现在不能再让孩子受委屈了。”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四川和接收大省的广东,收获最大的是相距千里、跨越40年的共同发展。”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李一漫说。

孙志成回到竹篙镇,办起了制衣厂;谷宇也回到金堂县高板镇,流转600亩土地搞生态农业开发。

漫步竹篙镇,王红琼和丈夫并肩走着,望着延伸到南方的大道,“你看,那就是当年我启程的地方。”她的笑容里写满历经沧桑的淡然和坚定。

“棉花姑娘”穿越40年的美好记忆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棉花姑娘”李爱荣(左)和李爱找到自己当年的照片后非常开心(2018年12月24日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来自山东济南的“棉花姑娘”李爱荣和李爱,在“新华社与您一起穿越时空”的历史照片前,回顾往事,畅谈变化。40年过去了,如今的“棉花姑娘”李爱荣已从人民教师岗位光荣退休,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新华社记者潘旭摄

依法依规规范税收秩序 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日前,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按照中宣部等五部门有关通知要求,自2018年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影视行业纳税人认真开展了自查自纠。截至2018年底,自查申报税款117.47亿元,已入库115.53亿元。目前自查自纠阶段已经结束,规范工作转入督促纠正阶段。

据了解,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部门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严格依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确定自查自纠适用的具体政策,对明星工作室等混淆企业和个人应税收入的,由影视从业人员个人据实区分和调整,充分体现了纳税人自查自纠的主体责任和义务。同时,为使影视行业纳税人全面了解政策,相关部门在采取上门、电话或信函方式逐一告知的基础上,对重点影视企业和从业人员,采取点对点、面对面方式,贴近需求辅导税收政策,以便利纳税为目标,设置纳税

服务专席接受咨询,开辟绿色通道热情服务;根据纳税人的意愿确定申报地点,便于纳税人办理自查缴税等事项,维护影视企业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在广大影视行业纳税人的积极配合下,规范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部分影视行业纳税人表示,通过这次自查自纠,既体会到了严格执法的力度,又感受到了优化服务的温度,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诚信纳税的意识。他们表示,影视行业受关注度高,作为从业人员,今后在履行公民义务、维护社会公德方面理应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依法依规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充分体现了纳税人的主体责任,对于解决行业突出问题,完善税收监管体系,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闫少非表示,规范税收秩序工作的开展,有效针对影视行业的突出问题,补齐了发展短板,化解了行业风险,教育了从业人员,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自查自纠结束后,根据纳税人的反映,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纳税人的自查自纠结果进行了反馈,让大多数影视工作者安心从业。在转入督促纠正阶段后,将有针对性地督促提醒自查自纠落实到位且且税收风险较高的小部分纳税人。对经税务机关提醒后自我纠正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税收管理基础和秩序得到有效改善。希望广大影视从业人员自觉追求德艺双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岗敬业、依法纳税,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影视工作者。

“公关公司”接单,“网络水军”秒删

鄂闽警方相继破获“网络水军”案,揭删帖“产业链”

几十万元“操控”舆情

记者调查发现,雇佣“网络水军”的以企业居多,目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获胜,或是为了消除负面舆情。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网安大队民警苏锋介绍,曾有企业在参与政府项目竞标过程中组织“网络水军”,大量发帖恶意攻击,导致竞争对手失败并损失逾百万元。

这些企业多数通过“公关公司”雇佣“网络水军”。荆州警方先后查处4家涉案“公关公司”,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这4家公司号称为客户提供网上舆情优化服务,雇佣“网络水军”批量清理对客户不利的网络信息。

据了解,“网络水军”在一段时间内舆情控制一般收费几千元。荆州查处的案件中,有时一个项目收费多达100多万元。

“水军”接单后,会以委托企业的名义向网站发函,申诉相关网帖不实或侵权,提出如不删除将提起诉讼,一些网站为减少麻烦直接删帖。

此外,“水军”还会贿赂网站管理员、版主、吧主等。办案民警介绍,有医院想删掉网上负面信息,诸如“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治好的病,在这家医院花了好几百都没效果”之类的内容,“水军”对接网站管理员“给好处”删帖。“大的网站删一条一般收两三千,小网站一般收四五百。”这位民警说。

据了解,“水军”收益颇丰。有团伙规定,成员月营业额超过10万元的提成可达25%,有的成员月提成最高达7万多元。

为了提高收益,有的“网络水军”团伙还自建网站,掌握信息发布、删除权。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伟,通过自建或帮助他人建设非法网站等手段,违规集纳、采编发布负面信息,共掌握控制“今日中国焦点”“民主法治网”“华人法治”“质量中国网”等100个网站的信息发布、删除权。

2018年1月至6月期间,钟某玲、赵某玲、刘某兵等人以每条帖文40元至50元的价格接单后,再以每篇帖文20元至30元的价格委托刘某伟进行发帖。仅

半年时间,这一“水军”团伙就炒作事件215起,有偿发布帖文近3000条,给涉事个人、企业以及正常网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刘某伟从中牟利30余万元。

强化“全链条”治理

不少办案民警表示,由于网络删帖即时性很强,已删除的帖文链接无法打开,甚至正在进行的删帖行为很多都是“秒删”,取证工作难度极大。

周龙、苏锋等多位办案民警认为,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必须强化“全链条”治理,除打击“网络水军”之外,对恶意雇佣“网络水军”发布虚假信息的企业和个人,以及参与其中的“公关公司”、网络管理员等,都要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翼腾认为,对于“网络水军”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和后果的,根据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信息网络有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达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程度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情节和严重程度,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和其他刑事犯罪。

由于“网络水军”多是跨地区、网络化开展行动,客观上增加了打击难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多位专家建议,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建立长效监管合作机制,打造跨部门、跨地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无缝对接、有机衔接的打击“网络水军”的合作机制。